

蒋廷黻 / 著
傅国涌 / 编

—— 一个历史学家的公共情怀



蒋廷黻

文
存



華齡出版社

蒋廷黻文存

蒋廷黻 著
傅国涌 主编
傅国涌 编

责任编辑：吴婧

封面设计：知尧视觉

责任印制：刘苗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廷黻文存 / 蒋廷黻著；傅国涌编.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1.1

(遗忘的文存)

ISBN 978-7-80178-798-9

I. ①蒋… II. ①蒋… ②傅…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7370号

书 名：蒋廷黻文存

作 者：蒋廷黻 著 傅国涌 主编 傅国涌 编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13

字 数：180千字

定 价：29.8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 真：84039173

出版说明

《遗忘的文存》（四种）收录了程沧波、毛子水、蒋廷黻、陈纪滢四位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文稿，包括评论、人物回顾、历史事件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文稿大多成稿于1949年以前，也有部分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这批文章系首次以简体字版方式印刷出版，考虑到作者生活的历史年代和读者的习惯，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在力求维持文稿的原貌的同时，在编写体例上尽量做了统一：

- 一、将文稿中的民国纪年统一为公元纪年；
- 二、凡文章题目后注明“节选”的，表明该篇文章不是全文；
- 三、由于现实原因，对文章中个别词语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些微改动；
- 四、对涉及到的台湾行政单位，按大陆行文习惯进行了标注。

尽管如此，文中仍会有使读者读起来感觉不太习惯的地方，敬请读者充分考虑文章的成稿背景，予以谅解。

蒋廷黻：书生论政到书生从政

傅国涌

蒋廷黻，“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学界、政界，他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是历史学家，以主张史学改革名动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著作不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在一九三八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本小书和他编辑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以及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将新观念、新方法引入史学教育和研究的努力，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由整理、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而进一步登上外交舞台，由中国驻苏大使，到晚年出任“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他以“知外交”而闻名于世，成为一位重要的外交家。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专家从政的一个典型，与翁文灏、叶公超、王世杰、朱家骅等人一样，都曾受到国民党政权的重用。

因为他的从政经历，他曾长期被遗忘。一九八七年，岳麓书社重印他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在前言中指出要“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我之知道蒋廷黻其人就是从他的这本书开始的。五万多字的篇幅虽小，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帮助国人清楚地认识本民族风雨沧桑、充满波折的现代化进程，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九四八年，推荐“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时，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称蒋廷黻“近代史尚无第二人”。郭廷以称他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开山的人”，“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李济在悼

念他的文章中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蒋廷黻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七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从祖父一代起，就兼营铁器铺。他六岁丧母，但受到了继母的善待。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经常为乡里邻居“排难解纷”。对他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二伯父，这位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安排他到教会学校上学，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接触新学，一九一一年他成了一名基督徒，也奠定了入世、用世的人生观。他曾对费正清说，他的学术航程的起点应归功于湖南的美国长老会所办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在一九〇六年—一九一一年间，他只有十来岁，她帮助他学英语，然后又帮他赴美国留学深造。

一九一二年，他十七岁那年只身赴美，经过三年半的半工半读才读完中学。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就读，主修历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为法军中服务的华工服务。一九一九年夏天重返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一九二三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四年中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一九二三年，蒋廷黻学成回国以后先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得到了张伯苓校长的赏识和支持。那时他已开始在教学之余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张伯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使他终生难忘。他之所以能在南开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与这种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辑的外交史资料，目的是使中国外交史研究学术化，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十一年之久，比一般留学生受到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属于受西潮影响至深的一代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但由于他少年时代就离开中国，连汉字都写得很蹩脚。回国以后，他从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古典诗词，中文写作也是在这里速成的，所以他的文字虽然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但文采并不怎么样。

一九二八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认

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一九二九年五月，他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相当重要的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一九三二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三十六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清华六年他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一九三四年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这是一部编辑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资料集，上、中两卷共收入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九五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七百九十九篇。他还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看法。他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清华时期恐怕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他的那些出色的专题论文大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有的几乎是翻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

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包容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中。因此，李敖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言中说：“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半。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历史学家，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五年，虽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写的，但主要观点在这个期间已经形成。他的后半生从一九三五年弃学从政开始，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驻美大使”等。晚年时，一位毕生做学问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謇的人多？”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清华教书期间，他本想用十年时间写一部近代史，这一宏愿终于因为半路从政而未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下卷最终也没有完成。

清华六年，他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作为研究外交史的专家，他发表的有关内政外交的独特见解，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与胡适论战时期发表的主张专制的文章恐怕也甚得蒋心。这就无怪一九三三年夏天到一九三四年六月蒋介石三次约见他。一九三四年七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一九三五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

从此他告别清华，踏上了弃学从政的不归路。上任不久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旧业也几乎没有可能了。好在他认

为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他之弃学从政丝毫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时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三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作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重叠交叉，互相摩擦。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澳洲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他曾热烈地鼓吹开明专制，以为民主行不通，没想到正是专制政体，成了他所追求的行政效率的最大障碍。起码到一九四九年，他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年十二月他在美国筹组“中国自由党”，在蒋介石的扼制下，很快就流产了。花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他最大的志愿，这个念头让他一生都魂牵梦萦，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一个初步报告”，不料却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句号。一九六五年他告别官场，曾计划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研究，不幸当年十月九日就在纽约病逝，终年七十岁。

他从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不惑之年步入政坛，追随蒋介石，热切渴望能有所作为。无论是任职“行政院”，还是驻外使节，虽然他的学养、见识、才能都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在风波起伏的时代大潮中，他以书生从政，试图力挽狂澜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在波谲云诡的权力舞台上，书生气十足的他无法做到左右逢源，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说：“廷黻为一有能力而不爱钱之人，但因其夙为孔庸之工作，为子文所不喜。”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王世杰日记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廷黻在联大十多年，辩论能力诚非中国一般外交人员所能逮，但对中外人士似均无‘人缘’，且虚荣心似亦太重，此其弱点。”其时正炙手可热的政要陈诚也说他“不易合作”。

“人缘”不好也好，“不易合作”也罢，都是说他恃才傲物，这既是他的缺点，也可以说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①，还发表过许多批评国民党腐败和政策

失当的言论，始终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无论是作为行政干才，还是作为外交家，他的政治生涯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选择也决定了他将长期被打入另册，无论是在身前，还是身后。当然，“存其文而原其人”，政治态度并不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抛开政治的是非，起码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应该有他的学术地位。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他传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他那些有分量的论文，他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其次是他任清华大学进行的史学改革，树立起全新的范式，培养了一代新人，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的近代史著作和回忆录都已陆续出版，蒋廷黻这个名字在读书界已经并不陌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生中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那些议论时政等问题的言论，还是今天许多人所陌生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一九三二年五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六十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这些文章迄今还没有在大陆结集出版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他自称信奉的是“新式专制”，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独裁，他崇拜的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他是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赞成以一人的大专制取消数十人的小专制。胡适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之间围绕着有关独裁与民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争。

直到在苏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蒋廷黻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一九四四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观美国并回观祖国》一文指出，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之本。自由主义能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更不应废除政治自由。他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他的观点，我们未必都同意，但是，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诚意则是容怀疑的。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专业上有一流表现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里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坦然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见解，其中关于教育、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的许多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读斯文，想见斯人，更让人怀想那个时代，在内忧外患中，那些选择了不同道路、有不同观念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有怎么样的分歧，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坚定的担当，而且尽其所能做了各自的努力。

注：

①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说，有“考据癖”的胡适晚年怀疑蒋廷黻可能加入过蓝衣社，因为一九五二年蒋介石曾让他转告蒋廷黻“还是回到革命党里来吧”，但没有证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目录

第一辑

-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节选）……2
- 论国力的元素……6
- 国家的力量——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在台大法学院讲演词……11
- 革命与专制（节选）……15
-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19
- 新名词·旧事情……24
-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序……27
- 中国的政治……28
- 提倡国货的治本办法……33
- 平教会的实在贡献……37
- 跋燕先生的论文……40
- 地方行政的几个问题……44
- 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47
- 北平的前途及古物的保存——“这一星期”之七……50
-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53
- 青年的力量（节选）……56
- 非常时期之青年……59

第二辑

- 知识阶级与政治……62
- 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67
- 我所记得的丁在君……71
- 追念梅校长……75
- 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76
- 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80
- 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85
- 教育的合理化——“这一星期”之三……88

中国的教育……90

高等教育的一方面——对台大的一项建议（节选）……94

第三辑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100

南京的机会（节选）……104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107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109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114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118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121

热河失守以后……125

九一八——两年以后……129

外交与舆论……133

帝国主义与常识（节选）……136

国际现势的分析……141

论“日本和平”……145

第四辑

经过“满洲国”——欧游随笔之一……150

车窗中所看见的西比利亚——欧游随笔之二……155

观莫斯科——欧游随笔之三……158

观列宁格拉——欧游随笔之四（节选）……163

赤都的娱乐——欧游随笔之六……168

出苏俄境——欧游随笔之八……172

俄德的异同——欧游随笔之九……176

矛盾的欧洲……180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187

第一辑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节选)

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像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的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却是大战以后，经苏联的革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诸国的法西斯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反而背道而驰了，至少是各向各方去了。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虽然，此中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斯塔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

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的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规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

关于欧西以外的国家接受科学机械文化的过程，有几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接受越早越便宜，越迟越吃亏。在同治光绪年间——十九世纪的后四十

年——远东历史的最重要事实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竞争，在那个竞争之中得胜者一切都得胜了，失败者一切都失败了。十八及十九世纪俄罗斯及土耳其的形势亦复如此，俄国能占领黑海以北的土地是因为大彼得在十八世纪初年为俄国立了近代化的基础，近代化的迟早快慢和程度是决定近代国家命脉的要素。

第二，科学机械文化从西欧向外发展的区域有两种。一种是土著的人很少，西欧人移居其中，把这种文化带去了，美洲及澳洲之成为西欧文化区域是因为美洲及澳洲成了西欧人居住的区域。另一种是人口稠密，西欧人不能移殖的区域，如东欧、中国、日本、印度。西欧人的势力到这些地方去的是政治经济的，不是移民的，这些地方能否近代化须看地方人民自己的努力。第一种区域近代化的过程是简单的，自然的；其经验没有可资我们借镜的。第二种区域的近代化都是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交迫中得来的，其过程之富有色彩和戏剧性是历史家和政治家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独揽大权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贵族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同治年间的权贵，在内恭亲王奕訢和大学士文祥，在外长江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在四国，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这不是说这四国的群众是比别国的群众特别顽固，无论在哪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数年之前，如苏联的民众能自由选择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维持分耕的。基玛尔假使遵从民意，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就不会实现了。我们在欧西文化区域内受过教育的人不知不觉的接受了那个区域内的民意哲学，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国进步上的再进步是可迟可早的，至少不致成为国家存亡的问题。欧西文化区域以外的国家则不能不积极的推动各种反民意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马斯哥的守旧势